，并落实相关优待政策。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对教师出资奖励，开展尊师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体现以人为本，突出教师主体地位，落实教师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教师参与学校决策的民主权利。推行中国特色大学章程，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教师在高等学校办学治校中的作用。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关心教师身心健康，克服职业倦怠，激发工作热情。  
　　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全力确保政策举措落地见效  
　　26.强化组织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充分信任、紧紧依靠广大教师。要切实加强领导，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紧扣广大教师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重大问题，找准教师队伍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坚持发展抓公平、改革抓机制、整体抓质量、安全抓责任、保证抓党建，把教师工作记在心里、扛在肩上、抓在手中，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细化分工，确定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和责任人。主要负责同志和相关责任人要切实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亲力亲为、抓实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研究一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建立教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重大问题。相关部门要制定切实提高教师待遇的具体措施。研究修订教师法。统筹现有资源，壮大全国教师工作力量，培育一批专业机构，专门研究教师队伍建设重大问题，为重大决策提供支撑。  
　　27.强化经费保障。各级政府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完善支出保障机制，确保党和国家关于教师队伍建设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优化经费投入结构，优先支持教师队伍建设最薄弱、最紧迫的领域，重点用于按规定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加大师范教育投入力度。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投入教师队伍建设的积极性。制定严格的经费监管制度，规范经费使用，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教师队伍建设列入督查督导工作重点内容，并将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全面落实到位，真正取得实效。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从移动支付到共享经济，大数据正在加速重塑着大众生活的诸多方面；从万物互联到智慧城市，大数据正在深刻影响着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的各个领域。了解大数据、掌握大数据、运用大数据，这是当下的现实课题，更意味对未来的判断和引领。  
　　大数据正在得到空前重视。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最近一年来，贵州、海南、四川等地陆续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工作方案或相关地方法规，以促进和保障大数据发展有序推进，各类便民应用层出，产业集聚明显加快。  
　　我国大数据发展现状如何—数据应用是否发挥应有效果？数据公开共享是否合理充分？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是否全面？近日，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深入调研，采写“解码大数据”上下篇报道。今天推出上篇《3问大数据》。  
　　——编 者   
　　　　　　　　  
　　大数据好用吗  
　　■应用领域不广泛   
　　■区域水平不均衡   
　　■行业融合不深入  
　　本报记者 吴 姗 钱一彬  
　　年度账单、听歌历程、出行轨迹……年初，多个互联网应用平台推出对用户使用情况的“个人总结”，买了什么东西、下了几次馆子、听了什么歌、去了什么地方……大数据似乎比用户更了解自己。虽质疑不断，但有趣的“用户画像”背后，是大数据应用越来越深入寻常百姓家。  
　　工信部发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指出，目前大数据仍存在应用领域不广泛、应用程度不深、认识不到位等问题。为解决更多需求痛点，大数据亟待打通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应用领域不平衡、业务融合不深入等堵点。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产业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和电信三大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在各行业总规模中所占比重超过70%；健康医疗领域和交通领域近年不断“上架”新应用，但行业规模占比相对较小；而其他众多民生领域，大数据应用仍处于浅层次信息化层面，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上海普陀区全面推广“社区治理云平台”系统，基层大数据让社区服务“掌上”可得；全国首个旅游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杭州旅游数据在线”上线，游客通过手机便可了解景点实时拥堵度、酒店好评率等信息……总体上，东部地区的大数据应用“刷新”更快。赛迪顾问统计显示，北京、江苏、浙江、山东、上海五大省市的大数据产业发展领跑全国，而云南、吉林、河北、内蒙古、广西等省区则相对滞后，大数据应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容忽视。  
　　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玩转大数据”的关键，在于大数据技术与业务实现深度融合。“目前，大数据在多个行业尚未与业务实现深度融合，应用场景创新不足，大数据技术人员需要提升行业业务知识和经验。”数据技术与应用服务商百分点首席数据科学家杜晓梦表示，国内很多行业仍仅在局部业务上使用大数据技术，仅掌握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如不能将技术与业务全面、深度地融合，则无法完全发掘出数据应用的真正价值。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到2020年，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30%左右，大数据在创新创业、政府管理和民生服务等方面广泛深入应用。未来如何在搜集、储存大数据的基础上更好地整合、分析和应用，将成为优化“数据大脑”的重点课题。  
　　大数据的生命力，在于发现问题、感知风险、建立连接、解决问题以及预测未来。目前国内的大数据应用侧重于数据收集，在基础统计分析、风险感知和预测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也不能在尚未明晰具体业务应用场景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大数据，而要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只汇集不分析或者片面追求大而全，都不利于大数据发挥其对生产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大数据广泛运用于创新创业、政府管理和民生服务等方面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大数据对社会的冲击有多大，社会对于大数据发展的回应、规范和约束就应有多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  
　　　　　　　　   
　　大数据畅通吗  
　　■收集标准不统一   
　　■信息壁垒待打通   
　　■供给需求不匹配  
　　本报记者 董丝雨 王玉琳  
　　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近年来，在《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的若干意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等文件的推动下，政府数据加快共享开放的步伐，惠民成绩单亮点不断。然而，由于我国大数据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不少基础性、关键性数据仍被政府部门束之高阁，共享开放程度低，成为现代化治理进程中的“路障”。  
　　有效的数据收集是实现共享与开放的基础。据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政府部门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收集到的数据虽然量大，但质量不高，可利用价值低。  
　　由于目前数据共享开放的法律、政策环境尚不成熟，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评估信息是否要开放等问题时，往往有所推脱。如果数据毫无关联地沉淀在各部门的信息系统中，缺乏共享开放的意识，甚至把数据资源视为“私产”，就会造成条块分割、重复建设，形成壁垒森严的“信息孤岛”。据此前媒体报道，长江上游地区一些省份的交通管理部门、运输公司不愿与其他省市共享物流信息，造成联运衔接的信息壁垒，甚至出现了同样1吨货，百公里公路运费比经济发达地区高60元的现象。  
　　供给与需求脱节也让数据共享和开放效果打上折扣。截至去年底，广东省全省87个省直部门有6988类数据资源、62332项信息项，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但各部门提出共享需求仅3649类，省级编目共享仅477类，数据难以真正发挥利民惠民、支撑政府决策的作用。  
　　此外，尽管部分数据已接入共享开放平台，但由于不能被机器读取，成为无法释放应有活力的“休眠数据”。《2017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报告》显示，截至去年4月，全国19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8398个开放数据中仍有约25%的机器可读性较差。  
　　去年12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提供公共数据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要求对分散、独立的政务信息系统加快清理整合，统一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依法依规向社会开放。如何继续加快数据共享开放的进程，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数据共享开放带来的红利，是未来大数据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当前我国政府数据治理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是认识问题，没有认识到数据治理对提高执政透明度和促进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反而认为没有直接的政绩产出；其次是责任问题，安全风险和问题追责等都影响政府部门开放数据的积极性；第三是利益问题，一些人认为共享开放数据，将导致原有权力或既得利益受影响；第四是能力问题，有没有物力财力可以投入，这是经济能力；有没有专人专岗协调，这是行政能力；有没有成熟技术可以快速应用，这是技术能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璜  
　　　　　　　　　  
　　大数据安全吗  
　　■越权收集花样多   
　　■数据黑市有隐患   
　　■安全防护存漏洞  
　　本报记者 许 晴 宋静思  
　　2018年初，对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安全的担忧再度升级：微信官方表示，不会将用户任何聊天内容用于大数据分析；支付宝因用户查看年度账单时“被同意”收集个人信息，被国家网信办约谈；百度则回应江苏消协称，旗下手机应用没有能力、也从来不会申请监听用户电话。  
　　数据作为大数据产业中的核心资源，已成为各家企业、平台的争夺对象。为采集数据，众多网站平台、联网设备、应用软件“各出奇招”。有网友质疑，连手电筒应用都要求读取手机通讯录、使用麦克风和摄像头，实在不合理。  
　　“究其原因，是因为数据变得值钱了”。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寿说，大数据是海量数据的聚合，没有数据，大数据如同无源之水。合法企业通过用户数据提供精准、便捷的个性化服务，从而实现商业变现，让大数据产业有利可图。  
　　除了政府开放的数据和企业自身收集的数据，数据交易也是数据的重要来源，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黑色产业链。据业内人士介绍，正规数据交易市场的交易额约为100亿元，而数据黑市的交易额度则庞大得多，盈利状况也很好。  
　　王叁寿介绍，正规交易的数据需要经过采集、清洗、脱敏、脱密、融合等流程，保障了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安全性，成本也相应提高。但黑市交易的大部分数据多由内鬼或黑客窃取得来，几乎是无本万利。比如，正规渠道的人脸识别数据价格为每条0.1元，而黑市上只需花1分钱就能获取同样的数据。  
　　去年3月，某知名电商内部员工被捕，因其涉嫌盗取涉及交通、物流、医疗、社交、银行等个人信息50亿条并在网络黑市贩卖；去年11月，深圳警方在华强北某投资咨询公司查获上千份公民征信报告，循线追查出售卖者为某商业银行深圳分行信贷部职员。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近七成企业曾在过去一年内遭遇公司内部人员窃取或试图窃取数据。  
　　大数据技术不断创新演进，传统网络安全技术也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7年）》显示，企业在选购大数据软件产品时，产品安全性和稳定性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业内人士指出，大数据背景下的攻击者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对攻击工具进行升级，提高网络攻击的精确度和隐蔽性。安全保护技术手段亟待强化更新，构建更可靠、更有效的大数据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网站和手机应用越界收集用户数据，根本原因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企业收集用户数据时，要尊重用户的知情权、退出权和自由选择权。要明确大数据和个人信息之间的关系：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范畴，而大数据一部分来源于个人信息，但本质是知识产权。  
　　现阶段，数据黑市问题严重，反映出《网络安全法》落实尚未到位，在制度上、人员上、技术防控上还有很大差距。立法不代表问题完全解决，还要加大力度、严格执行，技术上也要配合跟进，一步一个脚印，切实提高网络安全水平。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数字经济重塑全球竞争力  
　　数字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现实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等新图景，为大数据和社会治理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新政策，为进一步做好互联网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抓住机遇要快干，更要实干、会干。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地区重塑全球竞争力的共同选择。目前，全球22%的GDP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密相关，中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三成。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 侯云灏   
　　　   
　　进一步挖掘城市数据红利  
　　网络空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数据和信息太多，需要进行分析、判断、筛选、整理、挖掘，这是当今互联网大数据和社会治理关注的话题。我们非常期盼进一步把互联网大数据运用和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尤其是和南京的社会发展实践结合起来。近年，南京市成立了政务大数据研究院，在运用大数据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何进一步挖掘城市蕴含的数据红利，进一步打通信息孤岛，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我们深入思考、积极推进。  
　　——江苏省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曹路宝   
　　　　  
　　探索互联网+政务多元模式  
　　各地党政机关统筹兼顾，线上线下双管齐下，通过互联网、运用大数据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互联网+政务”多元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要抓住历史性机遇，打通政府企业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有效的共享和发展。人民网2006年建立大数据池和案例库，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以“数据+咨询+民意”为方向，以网络文明为地图，通过榜单指数研究，逐渐成为行业标准的引领者。  
　　——人民网副总裁 唐维红   
　　　   
　　单一数据再大也不是大数据  
　　大数据正在构建政务服务形象的新势能。一是洞察受众需求，开展针对性互动传播；二是发现公众需求，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单一的数据再大也不是真正的大数据，整合的、连接起来的大数据才有意义、有价值。2018年，我们将继续结硬寨、打快仗、广积粮、抓活鱼。结硬寨是要建立大平台微矩阵；打快仗是要第一时间掌握主动权，自媒体时代没有黄金时间，只有第一时间；广积粮是要最大程度掌握数据信息，贴近社会需求，生产正能量产品；抓活鱼是要借势借机蹭热点，加大互动化传播。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主任助理 闫 永   
　　　　   
　　多维度考量大数据  
　　大数据研究需要注意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区分。互联网治理、城市治理有大量的政策，政策的变化就是一个快变量。例如，房地产政策变化牵涉到银行、金融、土地等多方面，这些都是关于快变量的思考。而真正的慢变量是人的变化，例如，春运期间人口的迁移，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案例。另外，还要考虑个性和人性的问题。治理过程中，是不是每一个主体都能与时俱进？个性化有没有被充分发挥？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有全民参与，从而使智慧城市的治理从个性化走向人性化？这些都值得思考。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张礼立   
　　　   
　　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倡导政府管理部门与产学研等社会各界加强交流和合作，积极促成互联网大数据在法治的前提下开放共享，发展新时代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互联网大数据，包括互联网舆论平台上的思想观念类数据，以及“互联网+”平台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行为等数据，应与实体经济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相结合，有助于科学地评测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居民生活便利度、人民群众获得感。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副主任 祝华新   
　　以上观点摘自2018互联网大数据与社会治理南京智库峰会   
　　（本报记者 王玉琳整理）   
　　本报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季芳）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月3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5个大项、12个分项、55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表示，即将开赛的平昌冬奥会是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阶段性“大考”，是发展和提高我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的重要一环，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他要求代表团全体成员充分认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做好迎接一切困难和挑战的最充分准备，精心做好各项工作，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据了解，2015年时，我国仅开展了平昌冬奥会5个大项、11个分项、70个小项的项目，特别是雪上项目存在大面积空白。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通过科学化项目布局、跨界跨项选材、合作共建国家队等一系列措施，目前，中国冰雪已实现了平昌冬奥会102个小项全项开展，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面参赛奠定了坚实基础。  
　　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运动员人数达到82人，其中冰上、雪上项目各41人，参赛项目是除温哥华冬奥会获得女子冰球资格外范围最广的一次。中国代表团此次将有更多选手出现在冬奥会雪上项目的赛场，比如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雪车、钢架雪车等项目，是首次获得冬奥会入场券，实现参赛资格“零的突破”，尤其是雪车、钢架雪车两个新开展项目都是2015年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后通过跨项选材组建的队伍。队伍从零起步，通过两年时间，获得了平昌冬奥会3个小项的参赛资格，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不过，苟仲文同时表示，虽然一些项目取得了成绩突破，但是代表团依然面临着争金点少、夺牌点不多的局面，强项优势不突出、潜优势项目发挥不稳定、弱项全面落后的情况没有根本性改变。“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要调整心态、找准定位，调整状态、摆正位置，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为完成参赛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反兴奋剂问题，苟仲文表示，国家体育总局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抵制兴奋剂，从严、从细、从深、从实抓好反兴奋剂工作，做到落实落实再落实、保险保险再保险，确保中国体育代表团像冰雪一样纯洁干净参加冬奥会。  
　　1月31日成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一个大日子。这一天，中国足协向第一批15个青训中心授牌。一批足球专家和专业人才受聘成为青训顾问和各级总监，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中国足协还宣布将在辽宁、四川、深圳三地建立足球和田径混合选材基地，跨项选材实在落地。《中国足协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同一天颁布，青训机构和培训单位的权益得以进一步保障。  
　　健全体系  
　　青训中心的筹备工作历时半年，自2017年8月起，中国足球协会就派出专家组，兵分多路奔赴各地青训中心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和帮助各地查找青少年足球工作的疑点、难点和堵点。目前，中国足协已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暂行管理办法》，对青训中心实行申报、审核、评估制度。  
　　截至1月25日，共有24家单位发来申报材料，经过评估组对申报材料的逐一审核，结合前期专家组的实地调研情况，北京、上海、重庆、大连、武汉、成都、青岛、深圳、广州、延边、喀什、梅州、苏州、常州、普陀共15家单位获批为新周期第一批青训中心。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将建立健全“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省市体育局青训体系、城市青训体系、体教结合校园青训体系、社会俱乐部青训体系”五大青训体系为一体的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布局国内、国际两类青训中心，做大做强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杜兆才说：“中国足协将与各省区市加强合作，加快建设一批由中国足协主导、省区市共建、国内统一标准的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将其打造成为中国优秀球员的摇篮。”  
　　青训中心将成为中国足协的重要抓手，成为培养中国足球优秀人才的孵化器。中国足协会对各青训中心给予政策、管理等全方位的支持，进一步加大经费扶持力度，给予派驻青训总监、青训教练等直接技术帮助。各青训中心将在中国足协的技术指导下，开展球员集训、基层教练员培训，积极组织各类青少年竞赛活动，青训中心的地区和全国性赛事将逐步展开。  
　　和第一批青训中心一起揭晓的，还有青训顾问和各级青训总监，徐根宝、海斯特琳娜、达米亚诺、李树斌、孙雯、肇俊哲、杨玉敏分别受聘为青训顾问、全国青训总监和地区青训总监。这些专家名宿将负责指导中国足球青训体系设计、青训中心建设和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全面提升我国足球青训专业化、实效化和国际化水平。  
　　混合选材  
　　辽宁、深圳、四川三地被授予“足球田径混合选材基地”成为授牌仪式的一个亮点，这也是中国足协为鼓励“双向能力协同发展，探索足球人才培养新模式”的一次革新与尝试。  
　　足球发展对运动员提出了更高的身体对抗要求，基本的运动能力越来越重要。部分欧洲足球发达国家率先认识到了这一点，欧洲众多俱乐部的青训机构专门设计和增加了以速度、爆发力和协调性为主的田径运动训练内容，甚至还设置了专职的田径教练，并已经因此取得了良好训练效果。考虑训练观念转变对足球项目发展的重要性，为探索足球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和新路径，经过反复调研论证，中国足协最终决定在辽宁、四川、深圳三地建设“足球田径混合选材基地”，混合选材基地将以8—12岁青少年儿童训练为主。  
　　在中国足球历史上，从田径运动员转行成为足球选手的例子并不鲜见，国脚李华筠、谢峰、孙继海等都曾接受田径训练，女足选手温丽蓉、范运杰等也曾在田径场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完善机制  
　　过去，青训机构和培训单位吃亏不少，一些青少年球员年满18岁之后，在经纪人的利诱下，以各种理由不与培养自己的机构或单位签订职业合同，这种行为造成的伤害和负面效应难以估量。现在，情况终于有所改变。中国足协对现行《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的相关条款进行调整与补充，公布了《中国足协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  
　　中国足协副秘书长、竞赛部部长戚军对此进行了介绍，本次调整和补充，主要涉及八大方面，其中包括增加低年龄段青少年球员国内培训补偿年龄、调整国内青少年培训补偿费用标准、严厉打击通过利用涉外转会手段逃避培训约定的行为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重要举措。  
　　近期，有多名球员在培训协议期限内被经纪人签到了国外的低级别小俱乐部，然后再以高价卖到国内俱乐部，完成了“出口转内销”。中国足协将对此进行严控和打击，明确提出了“出口转内销”“出国涮水”的概念，一旦发现有球员在培训协议期限内擅自有类似行为，将受到中国足协24个月的停赛处罚。此外，在培训单位连续4年为青少年球员注册的情况下，小球员在年满16岁以后，培训单位如果能够提供不低于所在地区上一年度平均工资的3倍，则培训单位有权与球员签订不超过两年的工作合同。球员如不和原培训单位签订合同，则会受到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停赛24个月的处罚。中国足协还将青少年国内培训补偿年龄从12周岁调整为8岁。  
　　《中国足协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的发布，表明了中国足协加强与规范我国青少年培训与转会市场的管理，保护与鼓励长期致力于青少年培训的青训机构积极性，让青训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真正打造出高质量、易衔接、可持续的中国足球青训体系的决心。  
　　1月31日，浙江队球员索尼·威姆斯（左）在比赛中防守辽宁队球员赵继伟。  
　　当日，在2017—2018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第三十三轮比赛中，辽宁队主场以109∶91战胜浙江队。当日在本轮另一场比赛中，八一队主场以107∶117负于青岛队。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季芳）1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与清华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冰雪项目科技备战、人才培养、场馆利用、队伍共建、教育培训、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会上，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宣布短跑名将张培萌加入国家雪车队，主攻钢架雪车项目。  
　　据了解，针对冰雪运动人才短缺、竞技水平落后等问题，国家体育总局与清华大学将进行联合攻关，探讨共建国家队、跨界跨项运动员交流输送模式，系统解决冰雪项目备战冬奥会科技助力、